

主權之謎

張佛泉

在政治哲學中有若干問題都是極難解答的。原來這些「問題」本非實在的問題，而只可說是些「謎」（註一）。「謎」的來源主要在語文。「主權」（sovereignty）便是一例。

（一）政治哲學之語文

傳統政治哲學所用的語文，分析起來，可說有幾種普通的錯誤。現在試略舉如下：

（1）本質主義（essentialism）。

語文本吾人所發明之符號，用以指稱事物。然語文非即所描述之事物，語文亦說不盡任何事物。故「名」（word）與物，永保持為二，而不能視為一體。因之，在以語文解釋事物時，便難免發生錯誤（註二）。但如能將此類錯誤加以修正，或將原說不足之處加以補充，知識遂得增益。所謂本質主義，即以名當物，以語文中所舉之「本質」即當為物之「本質」，以所提出之學說即當「真理」（註三）。此種真理與本質當然為獨一無二的，絕對無誤的。此種本質主義應用於實際政治，便極易演為專制與極權（註四）。

（2）歷史定命論（historicism）。

歷史定命論乃本質主義之應用於時間者。歷史不被當為眾人以及諸代眾人的行為之總稱（註五），而被當為一「實體」，以為它自有其發展定律，自有其命運行程。此種歷史定命論有它不同的形式，黑格爾及斯本格勒的歷史哲學固為明顯的歷史定命論，即以科學家姿態侈言歷史定律、社會定律者，如馬克思，甚至斯賓塞等，亦正屬於此派（註六）。

（3）「定義思想」（“definiton thinking”）。

定義在吾人思想與語文過程中本有其重要功能。但「界定詞」與「被界定詞」實均屬語文層次，不可與所指稱的事物混而為一。若以「定義」與其所指稱的事物混而為一，即為本質主義。「定義」若無所指，即為文字遊戲。最壞的，即以無所指的定

義而當爲有此事物。譬如，吾人可爲「鬼」下一定義。若竟依此定義，到處去尋求此鬼魅，豈不可笑？然而在政治哲學及法律哲學中，此種「定義思想」實最屬尋常。

(4) 比 (analogy) 。

「比」在日常用語中是很有用的。在政治哲學語文中「比」也是常見的。例如柏拉圖曾以當政者比舵工，斯賓塞以立法者比鞋匠。然用「比」能恰到好處，並非容易。前人對此很少注意。「比」之適當限度何在，還待更多的檢討（註七）。

(5) 喻 (metaphor) 。

「喻」與「比」不同。吾人普通對此二者不加區分。實則「喻」與「比」有別。例如舵工可以比做當政，舟則譬喻爲國。政治思想中一大派別，「有機體的邦國論」(the organismic theory of the state)，實只建在譬喻之上，即以國喻爲生物。演化的國家論，則係在以國喻爲生物後，更以國之歷史比作生物之演化。以全部學說的主要論證只建在一個「喻」上，無怪隨之而來的錯誤更層出無窮了。

(6) 虛構 (fiction) 。

本無其物其事，在文字中假定或假託有此事物，是爲「虛構」。或以一事一物充當另一事一物，是謂「假充」。在法律語文中，「虛構」或「假充」均屬常見。例如「天然人」之外，法律尚承認有「法人」(legal person)。「法人」亦稱「虛構人」(persona ficta, fictitious person)。此種「虛構」之成，常由於「喻」與「比」。例如有某組合或某公司先被喻爲有人之位格，再以之與自然人相比，當爲它有法律上之能力，遂可承認它有某些權利與義務。法律不問此「法人」如何由喻與比而形成，凡能有某些法律行爲之社團，便逕視之爲「法人」。此法人之產生即出於「虛構」。又如人之過繼子女，法律視過繼之子女如同其親生子女，是亦爲「虛構」。

最佳的「虛構」例證，即爲「民約」(social contract)，尤其「原始契約」(original contract)說。古人不知區分社會與國，謂整個社會乃出自契約。此猶如謂人之文明生活乃首先起於法律中之契約，在歷史中如何能有此事？持此說者不過虛構此舉而已。

(7) 「神話」(myth) 。

「神話」(文字謎的一種)亦係出自「虛構」。較爲複雜的並有系統的虛構，即可稱爲「神話」。例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均假定在原始契約前另有一天地，稱爲「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此自然狀態即係一「神話」。又如吉爾克 (Gierke)

梅特蘭 (Maitland) 等以社團及國均自有其真實人格，便係由「虛構」演而為「神話」。再如蘇瑞爾 (Sorel) 之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寄望於大革命中之奇蹟，以及許多社會思想家之「烏托邦」，則是將「神話」投射於未來者。

故「神話」可分為適用於過去的及未來的 (註八)，又可分為單純的與複合的。複合的神話可能由單純的神話以及「比」、「喻」、「虛構」、「本質主義」、「歷史定命論」等因子綜合而構成。

〔關於「神話」一詞，有些作家 (註九) 用以指稱維繫任何制度之信仰，實失之於泛泛，為本文作者所不遵用。〕

(8) 方範 (prescription) 與描述 (description) 之相混。

在過去政治哲學中，「方範」與「描述」相混之例，比比皆是。如「自然權利」本為一種方範，係某種生活方式的一些根本條件 (註十)。但持此說者，却將此種權利比為「自然」權利，由於此一形容詞之借用，遂使「方範」偽裝為「事實」。眾人由是遂群起當為「事實」問題而爭論之，因之永不得解決。在此種爭論中所尤可惜者，並非光陰與紙張之浪費，而為此種「方範」在一解說中之適當功能之被誤解或抹煞。

(9) 問題之誤提。

一問題之能否得到正確回答，常須視此問題係如何提出。例如吾人可以提一連串問題，均使之得不到回答。此類問題在表面上看來似含極深哲理，實則其提出，常係由於頭腦之幼稚。在哲學史中此例極為充斥 (註十一)。在政治哲學中若干所謂永久問題，幾千年來，一代一代的提出，而從不得解答者，大率均為此類誤提的問題。例如「甚麼是正義？」。此問題之憑空提出，至少有三誤。(甲)似以「正義」(在西文中，此類名詞之第一字母常用大寫，且分性別)為有其物，一如問「甚麼是太陽」時，預定有「太陽」其物。(乙)係脫離社會生活條件與方法，而憑空提出者。(丙)此問題實包括數問題於內，如社會的正義，法律的正義，財產的分配，才智的發展等，殊難給一單純的回答，常使答者顧此而失彼。如所指係「才智的發展」，「甚麼是正義」一問即可改寫為：「在某時某地的各項條件下，如何能使每一及齡兒童得受義務教育……」。這樣便成為一有意義的問題，而可能給一有結果的回答。前一問題只是「文字的」(verbal)，後一問題則係「事實的」(factual)。大而無當的問題，類皆為空話。政治哲學中此例最多。

以上所舉九誤，並非單獨的或分開的，而係經揉合錯綜，相互支持，以織成一片文章。現試以主權觀念為例，進一步加以研究。

(二) 主權之謎

主權，在近代政治思想中，雖未必是「一襤褸而可憐的笑話 (a piteous, threadbare joke)」(註十二)，但如說它是一「謎宮」(maze)(註十三)，實非誇張其詞。西方自布丹以來，講主權的愈多，主權反而愈不可捉摸。作者被此「問題」困擾將三十年。近來方敢設想，這未必是我個人的愚頑不靈，而實係語文在戲弄我們。

在西方主權論者中間，有分析派 (the analytical school) 與哲理派 (the philosophical school) 最為主要。所謂分析派亦可稱為法理派 (the juristic school)。此派自布丹、霍布斯傳至奧斯丁，而集其大成，故又稱為奧斯丁學派 (the Austinian school)。布丹之開始講主權，係在尊王權，此時的問題尚係事實的。霍布斯之講主權，目的則在擁護司徒王朝，問題仍屬於事實的。只是他所用的嚴格的演繹法，與事實常不相侔，遂啓後人偏重「語文」之端。奧斯丁之法學講義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付印於一八三二年。英國第一次改革法案 (First Reform Act) 即係於此年通過。英國民主政治適值大有開展之時，何以奧斯丁反有此被稱為「真正奴役性的」(“truly slavish”)(註十四) 主權論之提出呢？此學說比起英美的實際民主制度已是「十倍以上過時的」(註十五)，何以從之者反甚衆呢？現先從語文觀點，對奧斯丁派所犯錯誤加以分析。

(一) 本質主義。主權原指君權 (sovereign power)，例如在霍布斯著作中尚可以看出 (註十六)。後來君之權漸縮，甚至在共和體制中，人君已不復存在。至此時，政治學者及法學家乃侈談「主權」。「主權」究寓於何處？實已無人能予指認。此時並不是先有某人某權，後以君權一詞指稱之，而係在局勢已變，原指之事物已不復存在之後，而仍襲用原有名詞，假託有此事物。說者不惟假託主權之名，並在談論既久之後，漸漸以為實有主權其物。西文在構造上有此方便，例如 *sovereign* 一字附加 “ty”，即成一極抽象之名詞。然 *sovereignty* 一字之使用，於文法上及句法中，與普通指稱實物之簡單名詞之使用，均無區別。故久用不察，遂不覺其為抽象，反感覺其為實在。至此，已不僅是以字與物視同一體，且係以字即當為物。這乃是最劣的本質主義。例如見「太公在此」，見「聖旨」等字，隨即跑拜，便已是拜字教的信徒了。

(二) 定義思想。奧斯丁論主權與實在法 (“positive law”) 似極嚴格。實在所爭者只為字之用法。奧斯丁以為惟有「單純而嚴格的被稱為法的」 (“law, simply and strictly so called”), 方為實在法, 此法乃係政治的在上者 (“political superior”) 對政治的在下者 (“political inferior”) 所發之「命令」 (“commands”)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ara. 1.)。如此固排除神聖法與自然法於「嚴格」法律之外, 同時, 習慣法因非「命令」亦被排除於嚴格的法之外。文字原無本義, 人均得自定其用法。奧斯丁有此權利, 自定某字之用法, 一如他人均有此權利。平常吾人共守某字之用法, 主要只由於便利或習慣。但如謂「法」字必如何使用, 方為「適當」, 而只許如此使用, 則係出於一種基本錯誤, 以為字有其正義, 乃生就如此者。這實由於以字當物。奧斯丁之後, 百餘年來, 法家集中全力爭此一「法」字之正義, 而終無從獲得結論, 即由於係文字之爭, 而非事實之爭(註十七)。奧斯丁以為發布此種嚴格法令的「政治的在上者」即為「主權者」, 同樣為字之定義問題。主權及主權者之定義可有所指, 亦可無所指。奧斯丁所下的主權定義 (para, 221) 則是無所指的。因在他的時代, 至少在英國, 已確認不出他所說的「主權者」。

(三) 奧斯丁派對主權特點之分析, 亦正是出於定義思想與本質主義。奧斯丁派的法理思想, 予人印象最深者, 即係其嚴格的推理方式。吾人如承認主權為最高的, 隨之即須承認它是無上的、最終的, 是不可限制的、無所不能的, 也須承認它是唯一無二的, 又須隨之承認它是不可分, 不能推讓予他人的 (inalienable), 是不能與同樣主權合併, 不能「自殺」的……(註十八)。這是此派最見長處, 亦正是最無用處, 最無意義處(註十九)。奧斯丁派若能承認此只是文字遊戲, 復有何傷。然而他們焉能有此覺悟。他們以為主權有其本性或本質 (essence), 以為所推演出的特點, 正係從此本質中必然推演而出; 因之必然能推行於世, 必須依此方式以支配人生。此說幸而未能在英美制度中得行其是, 若得認真推行, 便只有演為絕對的專制 (Austin 曾謂 “Every supreme government is legally despotic”. para. 339.), 並成為真正的奴役制度。二十世紀的極權政治實可說是此種主權論之在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等全面的應用。

(四) 奧斯丁派所遇最大困難, 即為主權之指認 (The location of sovereignty)。法國革命後, 實已發生此困難。「君」不復存在。「主權」究竟誰屬? 於是有民族主權 (national sovereignty)、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邦國主權 (

state sovereignty)等說的提出，更有法理主權、政治主權、主權屬於「共通意志」、主權屬於輿論、主權由於「是非感覺」(“Rechtsgefühl”, “Rechtsbewusstsein”)等說。依奧斯丁的定義「主權者」須為「確定的在上者」(“a determinate human superior”)又須為只發令而永不受令的人。主權遂與人作捉迷藏之戲，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神出鬼沒而愈不可得矣。此中苦惱實極易指明。這正如一人為「鬼」下一定義，眾人信以為實，於是羣起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於夜間提燈舉亮，到處尋覓此「鬼」。遍尋不得，不知放棄，反而彼此爭吵不休。文字之弄人，竟有一至於此者！

(五)分析派的主權論之另一可笑處，亦係出於文字。奧斯丁以其所制「法」之定義，否定憲法與國際法為「法」，而只稱之為「人為的道德」(positive morality)。這可說是定義思想與本質主義的反應。不合於他為 positive law 所下定義，即不是法！些許社鼠城狐，大法師不加「封號」與你，你們還有何怪作！

西方主權論的另一重要派別為哲理派。哲理派可謂創於盧梭。此派在論主權的特點時，與分析派大致相同。盧梭創共通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 之說，以之為主權之來源。後經黑格爾、格林、包三癸等人之發揮，遂成為主權論中之哲理派。

盧梭之政治哲學最為難讀，讀時初以為係其中之「詭語」(paradox)作怪，又由於一種幼稚心理作用，不敢自認不懂。惟有得到語文分析之助，始漸漸發現其中「奧妙」之處，原不能令人理解。以下之分析並無清算盧梭全部政治思想之意，不過只在指出他在語文方面觸犯了那些錯誤，以及這些錯誤如何相互為用，始得構成此「哲理的」邦國論與主權論。盧梭所犯錯誤，條列於下：

- (一)「自然狀態」之說，乃係神話。
- (二)原始契約 (“première convention”) 之說，則係虛構，假託。
- (三)「人乃生而自由」之說係由於方範與描述相混。
- (四)由此原始契約所產生之「共我」 (“moi commun”) 係出於「喻」。
- (五)「共通意志」出於「比」。
- (六)「共通意志」永不會錯之說，出於「定義」及「本質主義」。
- (七)主權出於「比」。
- (八)所舉主權特點 (Du Contrat Social 二卷一章至二章)，與分析派相同，出於「定義」。

(九)「創法者」(le législateur)有如戲台上在萬般無法中所出的神仙(*deus ex machina*)，係一神話。

以上各點，以第(四)「共我」之喻，最具關鍵性。霍布斯稱此新立之國曰「立維坦」(Leviathan)，介乎神人之間的「有死的神」(mortal God)。甚至洛克亦曾用「立維坦」以形容此政治體(註二十)。喻國為巨怪，其粗陋，人可共見。盧梭稱此新結合為「共我」，便具極大的迷惑性(註二十一)。包三癸後更稱之為「大我」、「上我」……(註二十二)。此一喻實係一大跳躍，向幻想世界的一大跳躍。「共通意志」及「民族主權」等說均立基於此。「我」有「意志」，「共我」遂可「比」為有「共通意志」。君之意志為立法之泉源，為「主權意志」；「共我」之「共通意志」同樣為立法之泉源，為「主權意志」。無「意志」即無法可言，譬如木石無所謂權利義務，尤不可能立法。故此「共我」必有「共通意志」。

盧梭之「共通意志」說，至黑格爾、格林、與包三癸手中更加理性化。包三癸甚至稱之為「真正意志」(real will)。然理性意志或真正意志依然出於比喻。所不同者，理想主義者所說的意志，係更「成熟的」，更「道學的」而已(註二十三)。

依「定義」，「共通意志」必永以「共我」之利益為利益，而永遠是對的。「共我」有時難免被欺蒙，然却不致敗壞，故永不會以「惡的」與「錯的」為目標。「共通意志」之本質有如明珠，雖入污泥，而終不染。

君權出於君之意志，國之主權完全出於「共通意志」。國之「主權」亦正係出於「比」。因已有「共我」喻「君」於先，主權一詞可輕輕拈來借用，而毫不覺牽強。個人之意志乃不可出讓的、不可分的，故「共我」之「共同意志」亦是不可出讓的，不可分的。「主權」恰為「共通意志」之發揮，故主權為不可出讓、不可分的。如此推演，全由於誤用比喻及定義之故。

(盧梭的「創法者」，正是 Lycurgus 一流的神話中人物，因與主權論無關，故不再加以分析。讀者可閱民約論二卷七章。)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說「主權」觀念不是一單純的而是一較有系統的神話。喀西瑞爾(Ernst Cassirer)著「國的神話」一書(註二十四)，內中未論及主權與共通意志，本文多少可作一補充。

喀西瑞爾在另一小書「語言與神話」(註二十五)中，對神話之形成與性質，曾作富有提示性的解說。他指出，語文可謂有三大作用，一為發展理智，一為鑄造幻想。

神話即屬後者，係語文所協助形成的。由前面對主權的分析，吾人可以看到，若不是在語文方面無意中犯了許多錯誤，並將錯就錯，以錯助錯，一個神話系統是不易完成的。但在此之外，我們還須承認喀西瑞爾所指出的，神話很能凝鑄感情於一點，集中並加強此感情或此意識。英美民主國中，何以竟能有盧梭與奧斯丁派的「十倍過時的」與「真正奴役性的」主權論之通行呢？我們至此已可提出更進一步的解釋。人有「定於一」的要求，故有「主權神話」。人不僅有「國的神話」、「主權神話」、「共通意志」的神話，並且有「民族主義的神話」（註二十六）、「種族的神話」、「階級的神話」、「歷史的神話」、「英雄領袖的神話」……（註二十七）。這些都是爲了滿足一些情緒方面或潛意識中的目的，或爲了支持一種制度，或爲了達成一種願望，或至少爲了助成一人或一姓的統治。

（三）結 語

「主權之謎」或「主權神話」既經揭穿，然則「主權」還可講否？「主權」一詞繼續採用與否，並不關緊要。我們不必堅決反對「主權」一詞，亦不必堅持繼續使用它。文字本身是無可愛惡的。要緊的乃在以「主權」指稱甚麼。洛克寫「政府二論」（一部上好的「邦國論」），他並未用「主權」一詞，這正是可佩服處（註二十八）。但我們如仍沿用「主權」一詞，亦未嘗不可。如從語文回到事實，我們可以說，主權不過是政治權力的運用與控制，這又不過是政策的決定（decision-making）而已（註二十九）。如此說，便立即去掉一切神秘。人在繁複的社會生活中，爲了馴服政治力量，爲了人權與自由，便以構成法爲條款，成立一種「結合」（註三十），稱之曰民主國。人在共同生活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均依此構成法的程序，以求解決。某些人依此構成法的程序取得他們的政治上的職位，依此構成法的程序作政策性的決定或日常的決定，依此程序運用某些物力與人力。所以這構成法程序，在解決有關問題時，便是最高的、最終的、惟一的。這程序也可以說是「主權的」（註三十一）。

總之，建在五行及「君臣佐使」等比喻之上的醫學，是講不下去的了。建在五行與讖緯等比喻與神話之上的政治哲學，也是講不下去的了。我們如能對所用的語文時加注意，要用它而不爲它所用，避免重大錯誤，永要顧到事實——在這樣小心之下，重造今日的政治理論，並不是不可能的。

- (註一) 參閱：T. D. Weldon, *The Vocabulary of Politics, an enquiry into the use and abuse of language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theories* (Penguin Books, 1953). Weldon 分 puzzles,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見 pp. 75-83. Weldon 的分析是富於提示性的。本文所用「謎」字，與 Weldon 所說的 puzzle 並不是相同的。
- (註二) 參閱 Bertrand Russell, *An E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Allen and Unwin, 1940, 1956)。
- (註三) 參閱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34 以下。關於「本質主義」一詞，各家用法未盡一致。
- (註四) 參閱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及 Hans Kelsen, "Absolutism and Relativism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原載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Oct., 1948)。此二文均已由 Princeton 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William Ebenstein, 採入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Rinehart, 1957) 一書中。
- (註五) 閱 A.M. MacIVER, "Historical Explanation" 一文，載 Antony Flew, ed., *Logic and Language* (Blackwell, 1953), 2nd Series. 此文見解甚合我心。
- (註六) 參閱 Karl Popper, op. cit. Popper 並有 *Proverty of Historicism* 一書，尚未得讀到。
- (註七) 閱 Renford Bambrough 的有趣文章 "Plato's Political Analogies" 載 Peer Laslett, e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Macmillan, 1956)。
- (註八) 參閱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Harvest Books, 1936)。
- (註九) 指 R. M. MacIVER 在 *The Web of Government* (Macmillan, 1947) p. 9. 及 Harold Lasswell and Abraham Kaplan 在 *Power and Socie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16-117 所用 myth 而言。
- (註十) 參閱 Margaret Macdonald 的好文 "Natural Rights," 載 Laslett, ed., op. cit.
- (註十一) 參閱 Alfred Jules 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Dover, 2nd ed., 1946)。
- (註十二) 見 Arthur F.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1908; reissued by The Principia Press, 1949), p. 264.
- (註十三) 見 Harold J. Laski, *A Grammar of Politics* (Allen and Unwin, 1925, 1955), p. 54.
- (註十四) 見 C. H. McIlwain, "A Fragment on Sovereignty," 載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March, 1933, p. 104. 麥氏在此文中強調 Bodin 的主權論尚知重自然法，而 Hobbes 與 Austin 的學說則是 "a truly slavish theory of the state." 麥氏此文已載入 William Ebenstein 所編 *Political Thought in Perspective* (Mcgraw-Hill, 1957) 一書中。Ernest Barker 在 "The Discredited State" (A paper delivered before a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May 1914) 一文中曾指出 Hobbes 與 Austin

的主權論“……is not of English origin.”他說，Bentham 的主權論也與此不同。他繼指出，Austin 的主權論與法律論“……fails to square with the facts of English political life and structure; and it is, one may suspect, French in its immediate and perhaps papal in its ultimate origin.” Barker 此文現收入 Church, State and Educatio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一書中。所引各句見 pp. 158-159.

(註十五) McIlwain 在前文中繼續說：

“In short, we have hitherto been satisfied to borrow and to retain, with little discrimination and no adequate examination, a traditional theory inconsistent with our national origin, outworn when we took it and tenfold more outworn now; a theory originally built upon actual conditions of civil strife instead of national wellbeing, and itself unfailingly productive of new strife, except when fiction or fact has stood in the way of its full operation.” pp. 105-106.

(註十六) 參閱 Leviathan 第十七章以下數章。

(註十七) 閱 Glanville Williams, “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Word “Law”. 這是一篇罕見的好文。載 Laslett, ed., op. cit., pp. 134-156.

(註十八) 閱 W. W. Willoughby,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ublic Law (Macmillan, 1924).

(註十九) 閱 A. D. Lindsay, 在 The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 215-217 對 Lansing 之有趣的批評。

(註二十) 見 John 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para. 98. Locke 與 Hobbes 不同處，在 Locke 只一提此名詞，且作小寫的 leviathan.

(註二十一) 盧梭除稱此新生之團體為 “moi commun” 外，並稱之為 “corps moral et collectif,” “personne publique” (見一卷六章)， “corps politique” (一卷七章)，及 “personne morale” (一卷七章，二卷四章)。

(註二十二) 見 Bernard Bosanque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Macmillan, 1899, 4th., ed. 1923).

(註二十三) T. H. Green 雖謂 sovereignty 與 general will 必須相合，且對盧梭之「共通意志」說有所批評，但他對 general will 並未有充足的解說。“Will, not force, is the basis of the state” 之 “will” 主要係指個人之意志而言。

關於 “real will” 之說，見 Bosanquet, op. cit., chaps. V & VII. 「共通意志」之謎，應是一篇文章的好題目。

(註二十四) The Myth of the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係 Cassirer 用英文所寫，脫稿數日，他忽於 1945 之四月十三日逝世。此書於 1946 年出版。

- (註二十五) *Language and Myth* 一書係由 Susanne Langer 譯成英文 (Dover, 1946), 因未得見德文本, 尙未查出原書出版年月。
- (註二十六) 閱 Boyd C. Shafer,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Harcourt, Brace & Co., 1955). 作者在 section II 中將有關民族及民族主義的神話, 分爲三類: some metaphysical myths; some "physical" myths; some cultural myths.
- (註二十七) 在各種神話中, 政治神話乃一「主要神話」("central myth")。特別閱 R. M. MacIVER, *op. cit.*, ch. 3, "The Myth of Authority." 他有一句話說 "The forms and kinds of myth are endless, but at the core of every myth-structure lies the myth of authority," p. 39.
- (註二十八) Harold J. Laski 在 *The Rise of Liberalism* 一書中說, ".....It is not accident which makes him [Locke] construct a non-sovereign state." 美國版 (Harper & Bros. 1936), p. 127.
- (註二十九) 例如 Harold Lasswell, 在 *Language of Politics* (Stewart, 1949) 中說, "When we speak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we mean the science of power. Power is decision-making. A decision is a sanctioned choice, a choice which brings severe deprivations to bear against anyone who flouts it." p. 8; 又在 *Power and Society* 中說: "A decision is a policy involving severe sanctions (deprivations)." p. 74.
- (註三十) 認爲國乃是一種 association 的作家, 我們可以舉 MacIVER, Barker, Greaves 等人。閱 R. M. MacIVER, *The Modern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MacIVER & Page, *Society* (Rinehart, 1937), 及 Ernest Barker,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H. R. G. Greaves 所著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 (Allen & Unwin, 1958) 一書中的第一章 "The State: Definitions" 特別值得一讀。
- (註三十一) 閱 John Dickinson, "A Working Theory [of Sovereignty]" 載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 1927, March, 1928; 及 Charles H.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ev. ed., 1947). 特別閱 A. D. Lindsay, *op. cit.* 及 Ernest Barker, *op. cit.* Barker 在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一書中即曾說道: "We can thus worship the free and sovereign Partyor the free and sovereign Electorate, or the free and sovereign Parliament, or even the free and sovereign Government. Really none of these is free and sovereign —by itself alone. The free and sovereign thing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discussion," pp. 44-45.

Lasswell 爲主權所下的定義 "Sovereignty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authority." (見 *Power and Society*, p.177) 雖較奧斯丁派大有進步，但終不如 Lindsay 及 Barker 的「主權在構成法」論更爲切實。Bertrand De Jouvenal 在 *Sovereign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一書中認爲「誰」作決定，與決定「甚麼」乃是要緊的問題。我以爲他恰巧忽畧了「構成法程序」的重要性。

The Myth of Sovereignty

Chang Fo-ch'üan

Prof. of Political Science

Many of th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re actually not problems but verbal puzzles. They are raised chiefly because of the abuse of language. Sovereignty is a case in point.

The common fallacies in the language of political theory may be suggested as follows: (1) essentialism, that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word with the referent; (2) historicism, the application of essentialism to history, taking history as a thing or an organism having a course of growth and a predetermined destiny of its own; (3) "definition thinking," taking mere words and definitions as real essences; the misuse and overuse of (4) analogy, (5) metaphor, (6) fiction, and (7) myth; (8) prescription confused with description; and, finally, (9) questions wrongly put—questions too vague and general to give any concrete or significant answer. These fallacies do not go single-handed but all work together to make up the central myth of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Austinian, or 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sovereignty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several of the fallacies mentioned above. It is essentialistic in assuming that there is an essence of sovereign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can be deduced from its very definition. Limiting the word "law" only to that "simply and strictly so called" and denying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name of "positive law" is to assume that there is a proper meaning of the the word. Only by metaphor in which a nation or a state is first compared with the sovereign king then by analogy can the nation or the state be said to have sovereignty. The effort to locate sovereignty in a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has proved to be entirely fruitless. The reason for this failure is obvious.

People searched for sovereignty in the actual world on the basis of mere verbal definition.

The language of the philosophical school of sovereignty is even more fallacious. Take Rousseau's theory for example. "The state of nature" is a simple myth (7), while the idea that "man is born free" is prescription confused with description (8). The "première convention" is a fiction (6), historically both untrue and impossible. The "moi commun" created out of this convention is obviously a metaphor (5) which, however,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Rousseau's system of thought. This "common self" must have a will of its own in order to give laws. Accordingly, by analogy (4), a "general will" is invented. By a further analogy (4), sovereignty of this "corps publiqu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xercise of the general will which, by its essential nature (1), is infallible. Further characteristics of sovereignty are easily deduced from the definition (3) of it. The "legislator" is a *deus ex machina*, another simple myth (7).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see how all these linguistic trick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up a seemingly profound philosophical system.

But myths are not just products of linguistic fallacies. Exploiting the weaknesses of a natural language, myths are created to satisfy people's deeper desires and aspirations, or to fulfil other social and practical purposes. A modern democratic state needs a symbol or an idea of unity. Paradoxically, "truly slavish" theories of sovereignty are invented to meet this need.